

(上接第四版)

拜伦在希腊赢得无限的崇敬和荣耀,但在其祖国却屡遭冷眼和贬斥。1824年6月底,他的遗体运回伦敦。按身份和贡献,他完全有资格安葬在伦敦的英国名人墓地威斯敏斯特大教堂。但是,英国政府和教会却以“道德问题”为借口,断然拒绝在那里给他一方安息之地。曾期待拜伦在功成名就后当面向他表示祝贺的歌德就此撰文说,“他使他的祖国现在和将来都享有令人惊讶的荣誉”,希望“他的国家将会从对他进行非难指责的迷醉状态中突然清醒过来”。但是,歌德没有想到,他的希望再次落空。7月12日,人们只好把拜伦的遗体运送到其先祖在纽斯台德封地附近的圣玛丽·玛格达伦教堂下葬。墓前竖立着一块石碑,碑文中说,他逝世时“正在英勇战斗,奋力为希腊夺回其昔日的自由与荣光”。

拜伦的朋友们为他定制了一尊雕像,本期望安放在伦敦的大英博物馆、圣保罗教堂或国家画廊,但这些场地均拒不接收,最后只好安放在他的母校剑桥大学三一学院的图书馆。不少英国人为此感到惊讶和羞耻,认为英国“对其真正伟大的儿子应有一种负罪感”。他们于是自动筹款,计划在作为英国文学殿堂的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的“诗人角”为他安放一个纪念牌位或胸像。但是,几十年过去,却没有成功。直到拜伦去世一百四十五年后的1969年5月,他的仰慕者才以诗学会的名义在那里为他竖起一方大理石纪念碑。简朴的石碑没有任何雕饰,除姓名、逝世日期和地点之外,也没有任何赞颂之词。竖立此碑虽然是后人诚挚悼念的表示,但却有违他本人生前之所愿,因为这个大教堂曾是他不屑一顾的地方,他的心永远在被压迫的人民中间。

现在,我们在英国看到的,一是希腊国王祭献的一块白色大理石纪念碑,摆放在拜伦家族封地的墓前,二是希腊政府为他捐建的一尊红褐色石雕像,安放在伦敦著名的海德公园的东南角。在石雕像高大的台基上,拜伦安详地坐着,左手按着放置在膝头的书本,右手则托腮沉思。他在想什么,他要说什么,任凭人们去揣测和评说。

拜伦生前曾自我调侃:“我是好与坏之奇异混合物,人们很难对我进行描述。”确实,他身为伯爵,性情孤傲,不时沉湎奢华和声色犬马,但他本质是走在时代前沿的诗人,正如鲁迅所说,他“超脱古范,直抒所信,其文章无不刚劲健抗,抗拒破坏挑战之声”。他“立意在反抗,指归在动作”,更是一名为实现自己的理想不惜牺牲年轻生命的勇猛斗士。他诗作的魔力和人格的魅力,都永世为后人所称道。

“旧锻坊题题”四序



当代著名学者的题跋本,既是图书市场的新宠,又是藏家的追求。“旧锻坊题题”丛书作者萧跃华历数年锲而不舍,收齐年逾八旬学者、作家姜德明、朱正、钟叔河、邵燕祥先生的全部(著编)作品,逐一请老先生签名题跋,说陈年旧事、匆匆背影,并试就其版别、开本、印数、掌故等进行考证梳理,以书里书外、轶闻趣事写成书香盎然之短文。

“旧锻坊题题”《姜德明卷》《朱正卷》《钟叔河卷》《邵燕祥卷》收入四老著编作品凡三百零八部(版),为读者了解前辈学人的文格与人格、文品与人品打开了一扇独特的窗口,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和文学价值。

征得作者同意,本报今率先刊发“旧锻坊题题”丛书(即将由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)四老序,以飨读者。——编者

爱读题跋

姜德明

读书题跋,古代就有,我读得最多的还是现代作家写的。我以为传统典籍我们不可能全部接触,读些题跋便可获得不少知识。同时,这种文体写来又很随意,没有一定的格式,似与读者当面交谈,很亲切,篇幅亦可长可短,以短为主。我最先读的是周作人和郑振铎,后来读的是阿英、唐弢、黄裳。在我做文艺副刊编辑的时候,没有忘记请后者写书话,实际

不少就是读书题跋。作者中还包包括谢国桢、路工、陈原等人。当然,孙犁同志的《书衣文录》更是题跋中的美文,吸引了众多读者的热读,引起文界的重视。无可争议的事实是,这些前辈作家都是真正的爱书人,自然有说不尽的话题。我非常羡慕他们的读书生活。

我偶尔也涉足题跋,但限于个人的思想水平,见识浅陋,更少文采,只好退而藏拙。不想萧君跃华出于好意,非要我在他藏的拙著上写几句话不可。我实在为难,提笔之后,不得不呆坐在那里想词儿,真笨人也。但愿见者宽容我的当众出丑吧。

2015年3月

小引

朱正

在我的数以千计的读者中(我每一本书的印数都是几千本,说“数以千计”是可以的),萧跃华先生是最热心的一位。我写的书,他全都有;我编的书,他也有许多。有些早年出版的书,市场早已售罄,他从网上找来……他让我在这些书上,每一本都写一点题跋。

这样的事情我以前也遇到过,有的读者也请我签个名,留作纪念。而萧先生不止是这样,我给他题跋之后,事情还没有完,或者说,事情才开始:他用这些材料写成了这一本《锻坊题跋录·朱正卷》。他为了写这些文章,不但细看了我的书,还去查找了我在题

跋中涉及的相关材料,包括我自己也不知道的材料。这样,这本书可以算作研究朱正的书了。

由朱正本人说出“研究朱正”这样的话,口气未免过大。不过,以果蝇之微,还有执着的摩尔根花大力去研究它,我又为什么不可以作为某一项科学研究的对象呢。我说过,在我们这个时代,每一个知识分子都是一个典型,换言之,也就是都可以拿来作研究对象。

其实,“研究朱正”这个题目,早就有人做了。政治运动中的办案人员,岂不就费心费力研究过吗,目的是要尽量找到能够给朱正治罪的材料来。当然,萧先生的研究,就完全是出于一种友好的态度了,写的多是溢美之词,希望本书的读者注意这一点。

二〇一五年三月十一日于长沙

题《题钟题》

钟叔河

先秦的题记,如汤之《盘铭》:苟日新,日日新,又日新。

唐宋的题记,如陆游之《题花间集》:

《花间集》皆唐宋五代时人作,当斯时,天下岌岌,生民救死不暇,士大夫乃流宕如此,可叹也哉,或者亦出于无聊聊取耶?

明清的题记,如张岱之《自题小像》:

功名耶,落空。富贵耶,如梦。忠臣耶,怕痛。锄头耶,怕重。著书

二十年,而仅堪覆瓮。之人耶,有用没用?

都词句简单,意味深长,几个字几十个字便是一篇绝妙文章,前人之本领实不可及。再来看萧君所题之“钟题”,则相形见绌,只有惭愧。

乙未霜降于长沙城北之念楼

也算书话

邵燕祥

我尝试过一些文体,但是从来没想过写“书话”。这回萧跃华君要出一组“题题题”,并拿来姜德明、朱正二兄写的小引当示范,让我也写一篇。

我拜读了姜朱二位的随笔,忽然若有所思:我在跃华指点下所作题跋,加上他的夹叙夹议,恰恰可算是二人合作的“书话”。在我,是从书外补充些有关情节或感想,寄托些感激和怀念;在他,虽有开头必须说明几句的套路,但接着也可以借题发挥。在不拘一格的意义上,这是自由的书话。

书话的作者和读者当然都是爱书的人,首先爱纸质的书,从来不管那些说纸质书将消失殆尽之类的预言和闲话。

朱正因他的书一般总有几千册的印数,故云自己拥有数以千计的读者。我的情况差不多,我感谢这些读者。而在这些读者当中,能够按图索骥,争取一本不落地搜集我的几十本书以及不同印次版本的,可以说萧君是独一无二的了。尤其难得的是不仅收而藏之,而且该是每一本都至少大体浏览一过,不然他不可能记得我自己都忘记了一些文字,一些细节。如果在读者中发“认真奖”,应该是他拔得头筹吧。

曾有人把作者和书,比作母亲和孩子的关系。我的这些孩子,都承跃华青睐,一一加以爱抚,我明知其间有不少溢美之词,但也一并收下,反正他虽人属“官家”,话却出自业余,只是一家之言,并不强加于人。或许出于偏爱,他对这些孩子身上的衣服以至衣上的纽扣等等,有时也不免求全责备,甚至语近粗砺,只得认作是早年留下的铁匠脾气,偶又流露些许吧。

2015年10月18日

从“希哲学”到“哲学”

■季蒙

说起来“哲学”这个词,在王国维那时代就使用了,据称该词语是从日本拿来的。时至今日,日本人自己对“哲学”这个词的态度是怎样的呢?也许木田元(日本著名的海德格尔专家)的一段话能够说明些问题。在《反哲学入门·始于误译》中他讲到,哲学一词本是日本最早研究西方哲学的西周的一个明显的误译,所以把哲学当成一个了不起的东西顶礼膜拜实在可笑。西周把 philosophy 翻译为“希哲学”,这是在把握苏格拉底的基础上,借用周敦颐“士希贤”一说造的。但西周摒弃了“贤”字,换成了“哲”字(贤哲?),译为“希哲学”——philein=希, sophia=哲,大致上是这样。

但是不知何故,西周从荷兰回国以后,删掉了“希”字,改成“哲学”。苏格拉底学说中最

重要的“爱(智)”的部分消失了,后来人们就一直用“哲学”这个词。

木田元对古希腊的情况看来似乎相当熟悉,他讲得很清楚,虽然看起来都是哲学人所知道的。他说,苏格拉底其实就是看不惯那些智者喜欢卖弄的德行,才用“爱知”一词进行讽刺罢了。哲学的原词是英、荷语的 philosophy 一词(兰学渊源),系直接借用古希腊的 philosophia, philosophia 由动词 philein (热爱)和名词 sophia (智慧、知识)组合构成,意为爱智慧,即爱知。可是,哲学作为一门学问无法直接称为爱知。前六世纪,毕达哥拉最初把这个词以 ho philosophos (热爱知识的人)的形式作为形容词使用。ho 是男性定冠词,形容词前加定冠词,表示具备某种性质的人或物。毕达哥拉斯将世人分成三类——ho

philarguros 爱钱的,比如商人;ho philotimos 好名的,比如军人、运动员;ho philosophos 爱知识的,比如他自己。

到了前五世纪,希罗多德将其作为动词 philosophein (热爱知识、热爱智慧)使用。但是,毕达哥拉斯、希罗多德的所谓热爱,只不过是模糊地表达了好奇心强或者求知欲旺盛等意;将动词 philosophein 变为抽象名词 philosophia 并限定了特殊意义的是苏格拉底。《会饮》中有一段苏格拉底对爱的描述——热爱知识、追求知识的人都是些没有拥有知识的人,正因为还未拥有才拼命地追求。没有知识即无知,也就是说爱知识者皆无知。正因为无知才热爱知识、追求知识。

这样看来,所谓的哲学在希腊古人那里原本只不过是一种生活方式、生活内容而已,到了后世才成为专门的研究家(哲学家),而这就是两者的区别。所以很明显,对希腊古人,称他们为智者,或者爱智慧者,似更恰当些。既然哲学一直也没脱离古希腊的传统,因此叫智学应该更合宜,而当初西周的那个误译也就可以避免了。